

文化 遗产 研究

集刊 6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化 遗产 研究

集刊 6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6/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309-09803-7

I. 文… II. ①复…②复… III. ①博物馆学-丛刊②考古学-丛刊
IV. ①G260-55②K8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2160 号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 6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编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 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4.875 字数 380 千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03-7/G · 1207
定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思想与方法 ·

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陈 淳	1
长江流域史前城址特征·····	郑 好 高蒙河	20

· 艺术史与文物学 ·

湖南出土简牍书法研究·····	沃兴华	42
元代工艺美术风格探析·····	赵 琳	60
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实态 ——明器中的写实世界·····	吕 静	82
关于鸿山越墓“玉覆面”的讨论 ·····	褚 馨 杨 茜	92
中国古代香的使用技术初探·····	霍小骞	106
从松江本《急就章》看汉魏草书流变与规范 ·····	李以超	126
佛教供养人“造像”与“题记”渊源考 ·····	赵 玲	141
宋元磁州窑瓷枕研究·····	陈力子	162
战国原始瓷长颈镂孔瓶略论·····	施 然 林 毅 郑建明	178

· 博物馆研究 ·

全国博物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刍议·····	陆建松	197
现代博物馆的教育优势及教育活动特点·····	郑 奕	209

高校博物馆研究现状述评·····	郭 驥 曹永均	221
我国博物馆与学校教育合作现状、问题和对策 思考·····	张 昱	230
试论高校博物馆运用网络新媒体营销·····	曹 默	243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博物馆 ·····	俞繁莉	249

· 探索与发现 ·

汉代灯具研究综述·····	麻赛萍	260
精读王国维先生《流沙坠简》(中) ·····	牛慕青 俞繁莉 戎静侃	271
西周金文里的“孝”及与东周孝观念之异 ·····	江 瑜	309
长江下游考古时代遗址分布的空白区·····	孙 林 熊 凯	323

· 遗产论坛 ·

从傣族制陶工艺管窥傣族与百越的关系·····	周晓红	340
遗产讲解展示试论与国际文件解读·····	徐智音	354
城市化进程与近现代遗产的保护 ——从青岛八大关近代建筑遗产保护谈起·····	朱 懿	371

· 科技与保护 ·

中国传统古陶瓷修复技艺探源·····	俞 蕙 张学津	381
清代中期釉陶“太平有象”尊的修复 ·····	杨植震 余 辉 李 冰 李一凡	390

· 域外采英 ·

安徽宁国府泾县产宣纸制造法 ·····	いのうえのおまさ 〔日〕井上陳政 著 陈 刚 译	396
------------------------	-----------------------------	-----

评估历史公园、历史园林的文化价值·····	
〔加〕琳达·迪卡儿·法玳(Linda Dicaire Fardin) 著	
翁玉玟 译	411
美国的公共考古学	
····· 〔美〕约翰·詹姆森(John H. Jameson Jr.)著	
付 蓉 译 陈 淳 校	433
唐代金银器	
····· 〔美〕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W. Kelley)著	
董千里 译 陈 淳 校	457
台湾高山族民俗展的意义	
····· 刘 咸 著 唐潇骏 整理 校对	466
《文化遗产研究集刊》征稿简则 ·····	470

· 思想与方法 ·

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陈 淳

前 言

2012年5月在张家港市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要重视文明探源中精神文明形成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被冷落但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而且它在文明探源中与生态环境、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等课题同样重要。如果能够在这个课题上取得成果,那么对于我们加深对早期文明起源、动力、性质和运转的了解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古代人类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并不保留在考古遗存中,因此难以企及。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克斯声称,考古研究所能企及的大体限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那些方面,而对人类最独特的那些方面则无能为力或很难加以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研究难度级别的霍克斯梯度,即从物质遗存来研究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比较容易,重建社会结构比较困难,而最困难的是重建意识形态^①。这一时期,虽然器物研究中无法避免古代器物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方法论,只能停留在推测的层次,比如将它们定为礼器

或仪式用品,很少探究其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和社会功能。而像柴尔德那样认识到宗教在古代文明中重要性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说,古人创造的迷信和虚幻世界对于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需的,这是支撑社会结构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的手脚架。城市革命最终被巫术和宗教所利用,登上宝座和拥有大权的是巫术而非科学。于是革命所开拓的新科学,常常被奉承迷信所羁绊^②。

到了过程考古学阶段,对人类物质遗存中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重视。比如,路易斯·宾福德就指出,器物是人类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反映,它的技术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应付生态环境,其社会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用它来协调社会关系,而其思想方面则反映人们的意识形态。宾福德以刀为例,表明其切割功能可满足生活需要,它的金质刀柄显示主人的高贵地位,而其刻在刀上的符号可能是祈求神灵的护佑^③。虽然过程考古学重视意识形态,但是却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环境适应的一种副现象,在重视程度上不如生存方式、聚落形态和环境适应研究。宾福德对考古学研究古代意识形态的能力也心存疑虑,认为考古学家所受的训练不足以从事古心理学研究^④。

后过程考古学开始将意识形态研究放到了这门学科的显著地位,并体现在这个趋势中的认知领域和象征课题上。后过程考古学家给予古代的思想、价值观、宗教信仰研究以空前的关注,有人指出,了解物质文化在祭祀和显示威望中的作用,是重建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⑤。由于“意识形态”是如此不可捉摸,而且无法从考古学记录来论证,以致于难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使认知考古学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无序、不系统和定义不清的特点。肯特·弗兰纳利和乔伊斯·马库斯认为,认知考古学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以及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⑥。

在考古学中,我们所见的大部分重要文明遗迹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和信仰的产物。从古埃及和玛雅文明的金字塔到英国的巨石阵,从殷墟的青铜器和甲骨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应该都是当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在世界早期文明社会中,大部分政治思想从本质上都是宗教思想。这是因为早期文明的统治者都试图将他们与一种永恒的神授秩序联系起来,以便使天赋的神力和神秘性能够支持和增强他们在世间的权威。上层阶级就是用基于宗教的意识形态来证明并确立其行为的合法性^⑦。

本文试图探讨早期文明社会里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与特点。虽然这种探索可能无法企及说明诸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在祭祀中发挥的具体功能或三星堆文化信仰何种神灵的问题,但是这种史前世界观的探索基于两点人类学理由:(1) 所有人类具有基本相似的心理过程和能力,人类社会不会产生无穷变异,而会显示随时间变化的跨文化规律。(2) 人类文化具有可识别的形态,即非物质的世界观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诸如聚落形态、艺术、建筑和丧葬实践方面^⑧。这一尝试希望在宗教人类学理论、跨文化比较的成果和早期文字解读的帮助下,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信仰的起源

宗教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宗教使人类行为超越自然与物理世界和生物界的界限,超越为获取食物与繁殖的需求而有了文化的意义^⑨。但是,宗教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它是现代人类的特点,其起源与人类体质与智力的进化相关。美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申指出,早期人类如能人、直立人和尼人的智慧由四个互不相通的板块组成。一是技术智慧,表现在石器制作的对称和式样的复杂性上。二是自然智慧,是有关动植物、水源和洞穴等景观地理的知识。三是社会智慧,一般反映在群体大小和营地的规模上。四是社会语言,一般从脑容量、神经结构和声道来了解。米申认为,早期人

类的大脑好比瑞士军刀,拥有应对特定行为方面的多种智慧,但彼此间缺乏互动。因此,虽然古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相似,但是他们缺少现代人智慧的关键要素:认知的流动性。古人类四种孤立的智慧到现代智人阶段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整体智慧,于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类文化所特有的艺术和宗教现象。然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如西欧的洞穴壁画,与今天非实用性物品和创作的艺术概念应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的狩猎采集者不会有现代人的闲暇和雅致来创作与生计无关的艺术。考古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并非是在舒适的条件下,而是在人们面临极为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创作的。艺术体现了古人类三种认知过程的结合,即脑子里的图像概念、交流意图和赋予的含意,标志现代智人整体智慧的形成,而这种视觉象征性的出现为宗教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⑩。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通常被解释为狩猎巫术,在这些地点举行某种仪式是保证狩猎成功和食物供应所必需的,其威力可能比拥有一支锋利的长矛更强大。

美国考古学家迪克逊指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形态表明原始宗教实践的存在:(1)物质现象反映宗教活动,如丧葬实践、壁画和可携艺术品。(2)中晚段更多墓葬的出现,包括妇女和儿童。随葬品的增加和葬俗的多样化。(3)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的壁画和可携艺术品风格有较大的一致性。(4)欧洲西南部,人类的居址与壁画所在地存在明显的空间两分,从洞穴壁画所在地缺乏生活垃圾表明,这些并非人类的日常居所。(5)壁画艺术各异,其质量和精致程度也有差异。(6)许多壁画位于不易到达的洞穴内部,可能易于创造某种类似梦境的幻觉。由于宗教活动是有组织的活动,与社会文化系统密切相关。因此,墓葬和仪式形式的复杂化反映了日增的社会复杂化^⑪。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特拉梅尔指出,宗教的产生是人类为了应对可怕且不可控制的状况。人类与其他生命都难免一死,加上期望与实际的差距、有限的寿命、疾病、恐惧、沮丧和残忍等不可操控和无

法改变的事实令人感到畏惧。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是人类与这些状况最终结局进行斗争的感情和智力手段。这种斗争通过对神灵的膜拜结合起来^⑫。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布瓦耶指出,宗教最普遍的特征就是相信无形的生命。他列举了宗教意识形态的三项常见特征,(1)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无形部分(如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2)认为社会中的某些人拥有与神灵沟通的特殊能力。(3)认为用恰当的方式举行某种仪式能够改变自然界。布瓦耶还指出,宗教意识形态的无形生命违反通常的生物学直觉知识,比如尽管认为无形生命可能有某种样子,但是它们并不经历生死、繁衍和兴衰的轮回。同样,它还违反物理学的直觉知识,比如无形生命(精灵)能够穿越时空和坚硬物体,来去无影。但是,它也有符合直觉知识的方面,比如它们会有像人一样的信念和欲望。布瓦耶认为,正是这种违反和符合直觉知识的混合成为宗教意识形态中超自然生命的特点^⑬。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发展阶段,认为科学是文明的最高形式^⑭。然而在史前社会,巫术、宗教和科学并不分家。比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太阳历的科学知识就是在宗教迷信的实践中创造的。因此,我们现在称之为巫术和宗教其实是古代人类看待自身和世界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布瓦耶指出,宗教源于人类的头脑需要说明、人类内心需要慰藉、人类社会需要秩序。人类智力易于幻想,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谜团。人们被各种令人费解的日常现象所包围,比如日月的起落,雷电、降雨、洪水的发生。对于这些现象,神灵能够提供满意的解释。在许多神话中,天上的星宿就是各路神仙。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太阳神、雷神、土地神、火神、战神、死神等各种掌控自然和人世现象的神祇。宗教也为令人费解的大脑活动提供解释,比如梦境和灵魂,死去的亲人和祖先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与人们在梦境中沟通。幽灵则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我们在梦境和幻觉中见到的故人或神灵。宗教可以解释世间生物的起源,人

们目睹生物的兴替,但是无法说明其来历和原因。而上帝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宗教除了为人们提供解释外,还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供管理机制。宗教可以将各怀私利的个人聚集起来像一个整体那样行动。宗教可以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秩序,支持和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以阻止犯罪、偷盗和背信弃义。相信和畏惧上帝对每个人操行的监控,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的正常秩序^⑤。

原始社会的迷信、神话和巫术被现代社会所轻视,但却是当时社会的必然。正如爱德华·泰勒所言,这种信仰为蒙昧人群所固有。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也是以人类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人类较低智力状态会将彼此有实际联系的那些事物联系起来,但是却曲解了这些联系,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们还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发事变,使之具有纯粹幻想的性质^⑥。但在原始社会里,巫术还是具有某种积极的力量。柴尔德说,巫术是由科学实验一样的推理所激发。新石器时代革命并不曾废除巫术,实际上正好相反。面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人们仍然用祭祀、符咒和魔力来趋利避害。任何以自己魔力成功控制这些未知因素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赢得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太阳历的发现就是古埃及国家王权的来源之一。柴尔德还对巫术和宗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由非人格化的力量所直接控制,而後者的力量是人格化的,因此可以像人一样用恭维和祈求来施加影响^⑦。由此可见,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说与人类世界观的发展息息相关。

宗教与社会复杂化

社会人类学家以不同的模式说明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比如,罗思曼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功能上的“分异”和“集中”。分异是指职业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⑧。麦奎尔将社会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和“不平等”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

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①。多尔认为社会复杂化表现为三个过程,一是结构的分化,二是功能的特化,三是结构与功能整合到新的机构层次^②。迪克逊认为,多尔的模式比较契合宗教体制的发展。社会越复杂,宗教信仰和实践也会表现出更加多样化、异化和特化的特点。他以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定义的四类宗教机构来描述宗教信仰的发展。这四个宗教类型包括:(1)个人宗教,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宗教形式。其特点表现为仪式无需由萨满或巫师等专职人员操纵。大部分游群的宗教实践属于这个类型。(2)萨满教,其特点是由兼职的萨满操纵。这些萨满或与生俱来或通过训练获得了一种与超自然力量、神灵和祖先沟通能力。(3)群体宗教,是比萨满更复杂的一种宗教实践,见于有相当人口规模、政治和经济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存在专职的宗教人士。(4)教会宗教,是最复杂的宗教形态,仅见于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系统。其特点是存在全职的神职人员,并以一种等级制组织起来。宗教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复杂宗教类型出现后,简单和原始的类型仍然会继续存在^③。

美国人类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在谈到过去几千年来宗教理论与实践的一般性发展变迁的特点时指出,当人类从小型、孤立的社会向大型、复杂的都市社会发展时,宗教信仰会发生四种变化:(1)神祇会逐渐退出本地的舞台。(2)拟人化会减弱。(3)宗教日益与日常事务分开。(4)宗教的同质性减少。(5)宗教系统开始分裂,并发生冲突。所有这些发展特点可以归为世俗化的趋势^④。由于教会宗教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形态,因此在史前或早期文明阶段,宗教形态至多发展到群体宗教的层次,仍表现为强烈的萨满教特点,只是主持仪式的祭司可能已由贵族或专职人士承担,而且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萨满和巫术关注通灵、治病和驱魔等实践范围。

在研究史前或早期文明社会中的宗教时,最大的问题是将原始宗教和意识形态与后来或晚近超凡脱俗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古埃及有“神”、“祭司”和“崇拜”这些词汇,却无

“宗教”这个词,因为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早期文明社会像游群和部落一样,并不像我们那样在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些原始人看来,他们所处的自然界,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并因它们而生意盎然。因此,自然和超自然并无区别,所有东西都是活的、有意识的、并且相互关联的。自然界由拟人的力量所操控,只不过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些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神祇和精灵。大约从公元前第一千年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希伯来的犹太教、波斯的祆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的绝对束缚,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神灵的超自然世界区分开来。在希腊,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否认超自然的存在,只有社会和自然界才是与人类相关的领域。晚期的欧亚前工业社会一项最伟大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发现,是注意到自然界根本不同于人类社会。于是,人类的思想开始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以理性的思维看待社会和自然界。每个思想家的传道解惑成为一种认知的基础,起先它只是吸引个别的追随者,后来则是整个民族。这些思想体系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体系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恰当地将人类世界观发生巨变的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②。

虽然古代社会的人们将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不分,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明白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特定的石头可以用某种方法打制,黏土烘烤后能够变硬等。古人与现代人世界观的差异主要在于看待天地万物的性质。古人会以他们的理解来看待世界,将其视为与人类社会相同。宇宙是由像人一样的强大力量所主宰。于是,当人类需要超自然力量来帮助他们克服自然和社会危机时,就能求助于它们。古人可能深信,凡是可以说出、写出、画出的事物,在一定宗教仪式的魔力作用下,可以变成现实或另一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古代信仰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③。

由于早期文明社会将超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体,因此当时社会可能将取悦神灵看作是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

重要的生计。美国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指出,在意识形态上,酋邦普遍表现为“神权”性质,普遍建造巨大的纪念性建筑来创造神圣景观的仪式地点,以便使将尘世与宇宙相连。在仪式中,酋长扮演“神”的角色^⑤。在早期国家里,国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布鲁斯·特里格指出,早期文明的国王位于社会的顶点,成为联系世间万物和社会福祉所系的超自然力量与人类之间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关系由仅限于国王及其代表所掌控的祭祀仪式来协调^⑥。这种沟通人神的特点,使得早期文明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萨满教或巫术的特点。张光直就指出,中国早期的巫与萨满具有极为相近的功能。

萨满源于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专指能与神灵沟通的巫覡。后来它被视为古代宗教的普遍形式,常与现代其他正式宗教如佛教共存。萨满活动的主要焦点就是出神的降神会,萨满或巫师用这种仪式来治病、驱魔、调解和占卜。仪式以击鼓、唱歌、跳舞、穿戴精心制作的盛装来表演^⑦。虽然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宗教属于“群体宗教”,但是其与神灵沟通的仪式与萨满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扩大,主持仪式由酋长或专职人士掌控,酋长用这种降神的力量来强化他的地位和权力。

弗兰纳利和马库斯用乔纳森·弗里德曼研究缅甸克钦人的民族志资料,介绍了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平等群体中,社会是由一系列平等声望的世系所构成。有一个村寨神被视为所有当地世系的遥远祖先。在更高、更遥远的地方有一批“天神”,在此平等阶段,任何一个世系都能通过自己祖先的媒介与这些“天神”沟通。在向等级社会的转变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村寨神被某特定的当地世系所垄断。于是,该世系就转变为首领世系。这个首领世系现在与主要天神直接相连,并与他有姻亲关系。该贵族世系的首领成了在超自然和社群之间进行沟通的调停者,旧的平等意识形态现被世袭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当部落社会向酋邦制转型时,形成中的贵族世系——本来只是在轮流做东的情况下才由他来

代表其社群——逐渐开始永久接管宴庆主办者的工作^⑧。依此类推,早期国家的国王只不过是垄断了整个社会与神灵沟通的权力而已。

张光直指出,巫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只有掌握着人神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和权力。于是巫便成立每个宫廷必不可少的成员。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功德都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甲骨文中,有商王占卜问风雨、祭祀、征伐或田狩的记载,也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它表明,商王就是巫师^⑨。吉德炜认为,商人将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所为,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将神圣和世俗区分的观念。于是,像刮风和下雨这样的现象天生就有神圣的意义。甲骨文显示,商人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由风神或雨神所造成,但是这些神祇是听从帝或土这样的最高神祇的驱策^⑩。

这种萨满教传统在西周仍然延续,郝铁川认为周公也是一个巫师。理由是:(1)据《史记》记载,周公曾先后两次为武王、成王两次跳神治病。(2)西周的巫祝卜史官职通常为家族世袭,周公后裔邢也为太祝。(3)西周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是由周公亲自进行。(4)巫祝的一个职能就是看风水,周公曾为兴建东都洛邑占卜。(5)周公在摄政时,用商代巫祝卜官辅佐商王的先例以证明自己辅佐成王的合法性。然而,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应该在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他为治国方略建立起世俗的道德法规,为将依赖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做出了贡献^⑪。这似乎是东周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轴心时代”来临的先声。

意识形态的物化与研究

如果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看作虚幻的思想活动,那么考古学可能对此束手无策。但是,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 and 一体化超出个人和社群的范围,变成酋邦和早期国家全体民众

的身份认同时,统治者必须采用文化手段和政治策略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将意识形态加以物化,使之成为具体而有形的表现,可以用来反复教育和团结其臣民。于是,考古学家便能从各种物化手段来解读古代的意识形态。德马里斯等人介绍了意识形态物化的四种表现^②。

第一种就是祭祀仪式。通过举行和参加仪式、舞蹈、宴饮和布道,主持者在参与者中培养一种共享的经验,并用作协调社会各阶层权力关系最有力的手段,包括争权夺利的部落首领到新征服的社群。在许多社会中,仪式会在固定时间,按农历或节庆周期重复举行。许多仪式需要消耗大量食物和用品,展示各种塑像和象征性物品。在酋邦社会中,酋长定期举行仪式和宴饮以展示他调动资源无人及的能力,以培养臣民对他的依赖和忠诚。早期国家的仪式除了炫耀巨大的财富与国力外,还明确展示权力的不对称。有些仪式会用人牲来展现政治高压。仪式用品会仔细设计制作,以符合表演和演员的不同标准。

第二种是肖像和象征物品。它们包括个人的仪式用品和服饰、绘画、各种雕像和图徽。可携的象征物品有利于在个人、社会团体以及政体之间流通,以确立依附、联合或对应关系。由于象征物品能够拥有、继承和转让,于是它是个人社会地位和权力最好的标志。在墓葬里,随葬品在墓主人死后仍然发挥着这种功能。象征物品一般限制流通,因此极为珍贵。

第三种是纪念性建筑和景观。一些公共建筑如人工土墩和金字塔、大型建筑物、政治活动中心和防卫建筑,能够令臣民叹为观止,对统治者的力量和权威产生敬畏之心。有些大型建筑物如金字塔能被广阔地域内的民众目睹,是进行教化、控制和宣传的理想工具。纪念性建筑也会用作仪式场所,贵族和统治者会通过对这些建筑使用来显示他们的地位,比如埃及、玛雅国王和贵族的墓葬往往被安置在金字塔建筑之下。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良渚文化的祭坛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